

締宋：宋孝武帝劉駿 對劉裕形象的複製與轉化

劉苑如*

摘要

本文擬透過有關劉宋和北魏雙向的歷史書寫，運用相關的文書與文學作品，包括有韻的廟歌與詩歌，和無韻的詔令章表，探討宋孝武帝劉駿形象的書寫，如何受讖、刊定內亂與收復失土，疊映其祖宋武帝的身影；另一方面，該文解說劉駿懲於其父宋文帝三次北伐失敗的教訓，改變了宋、魏軍事征伐對抗模式，轉而致力於復禮輯樂與文學競爭，在在透過「文」的實踐，諸如將其父劉義隆的謚號，由「景」改為「文」，以期符合謚典中「經天緯地曰文」之意，刻意推尊其父的文德，以其掩飾其武功失敗的記憶；除了復禮輯樂之外，劉駿還以國家之力興復國學，透過帝王雅集大力推動文學，締造「大宋」的嶄新形象，亦即重新塑造一個人文化成的文字帝國，進而延續整個南朝尚文的文化氛圍，形成當時對抗北朝的另一種戰爭表現。

關鍵詞：劉駿、劉宋與北魏戰爭、受讖應符、改謚、文的實踐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Reconstruct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Repl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u Yu's Image by Emperor Liu Jun of the Song Dynasty

Liu, Yuan-Ju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Emperor Liu Jun's portrayal in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the Liu Song and Northern Wei dynasties. Drawing on literary sources such as temple hymns, poems, edicts, and decrees, it examines how Liu Jun mirrors his ancestor Emperor Wu through omens, internal pacification, and efforts to reclaim lost territory. Learning from his father Emperor Wen's failed northern campaigns, Liu Jun shifted focus from military confrontation to cultural revival. He emphasized the restoration of rites and music, literary patronage, and symbolic gestures such as renaming his father's posthumous title from "Jing" to "Wen" to enhance literary legacy and obscure military defeats. Liu Jun also revived national education and used imperial gatherings to promote literature, crafting a new image of the "Great Song". This cultural emphasis helped establish a literary identity for the Southern Dynasties, serving as an alternative form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North.

Keywords: Liu Jun, Wars between Liu Song and Northern Wei, Prophetic omens, Posthumous Title Changes, Practice of Literature

締宋：宋孝武帝劉駿 對劉裕形象的複製與轉化

劉苑如

帝錫二祖，長世多祐。於穆睿考，襲聖承矩。
玄極弛馭，乾紐墜緒。辟我皇維，締我宗宇。
刷定四海，肇構神京。復禮輯樂，散馬墮城。——謝莊〈世祖孝武帝歌〉¹

一、前言

在傳統中國的觀念裡，普遍認為人間秩序是淵源於天，天子承受天命，將秩序的原理落實於人間，而天命與秩序的落實，又須藉由天子推動教化。換言之，天子的職責是上承天命，下施教化。而這種落實在人間的秩序原理，在中國的語境裡常被稱之為「禮」，往上溯至天道與天命，也即是天地節文之展現；往下廣泛規範人們的生活習俗、交往行為、宗教信仰等社會活動。相較於湯武革命，以及後世的改朝換代，魏晉南朝王朝的建立，皇帝權力的起源來自君臣間的「禪讓」制度，必須透過「去臣化」的過程，進行新權力的轉移；而權臣往往以先掌握軍事朝政為始，受封為相國，達到臣的最高層次，而後經由勸進、九錫之禮等禮、文的操作，暗促君主賜予權臣大位，以完成統治交替。²而如何得知天命？又如何參與並塑造政治語境？自古符瑞讖言則成為重要的文化工具。³

¹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20，頁581。

² 徐沖：「漢魏革命」再研究：君臣關係與歷史書寫》（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頁5-16；朱子彥：〈易代鼎革：九錫與禪讓制度〉，《多維視角下的皇權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61。

³ 相關研究甚多，然最具理論性者，詳參呂宗力：〈讖言與讖謠〉，《漢代的謠言（修訂版）》（成都：四

謝莊（421-469）〈世祖孝武皇帝歌〉載於《宋書·樂志二》，可視為劉宋朝廷對孝武帝劉駿（430-464）功業的總評與定位，此歌重點凡三：一即延續宋武帝、文帝的正統（「帝錫二祖」、「襲聖承矩」）；次即重塑劉宋疆域的空間感（「締我宋宇」、「刊定四海」）；三則奠定王畿及禮樂制度等王朝建構（「肇構神京」、「復禮輯樂」）。凡此似乎有別於《宋書》與《魏書》的論述，多偏於對孝武帝劉駿的惡評，諸如性嚴多疑、好色無禮等，著眼於其人格缺陷。⁴然而揆諸現今學者的意見，則多能理性看待，譬如日本學者戶川貴行的一系列文章，即從元嘉 27 年（450）北伐失敗的背景，探討南朝在軍事上處於劣勢，想要恢復中原變得極為困難，在此情況下，孝武帝劉駿勢必須改變過往以洛陽中心的天下觀，因而亟需克服地理的「邊緣性」，乃有諸多措施，包括建王畿、設明堂、造五輅、南巡霍山，乃至在國家禮儀中導入民間音樂等，試圖透過視覺化、具體化和禮儀化等象徵形式，重構江南政權的王朝形象，藉此主張南朝的正統性。⁵李磊則注意到劉駿的皇位繼承權，並非來自於宋文帝的指定或制度安排，而是源於平定元嘉 30 年（453）太子劉劭（424-453）弑君之亂，由於資望不足以駕馭荆、江、兗、豫等方鎮勢力等因素入手，是以先後舉兵討伐其叔劉義宣（415-454）、其弟竟陵王劉誕（433-459），此即謝莊〈世祖孝武皇帝歌〉中「締我宋宇」、「刊定四海」的敘述背景，然而卻也認為其實質內涵，只是通過與北魏相互承認其疆土，穩定宋、魏邊境，以維繫既有疆土；另外亦指出大明 3 年、4 年間設王畿、立明堂、造五輅，乃是以天人學說重構統治的合法性。⁶可見劉駿不僅承繼了南

川人民出版社，2023 年），頁 203-298。

⁴ 前者如梁·沈約：《宋書》，卷 94，頁 2303。〈恩倖·曹尚之傳〉曰：「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後者如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97，頁 2144。〈島夷劉裕傳〉曰：「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穢汙之聲，布於甌越。」梁·沈約：《宋書》，卷 41，頁 1287。〈后妃·文帝路淑媛傳〉則曰：「上於閨房之內，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內，故民間喧然，咸有醜聲。宮掖事秘，莫能辨也。」

⁵ [日]戶川貴行：〈劉宋孝武帝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建康中心の天下觀との関連からみた〉，《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 36 卷（2008 年 3 月），頁 68-87；[日]戶川貴行：〈東晉南朝における民間音樂の導入と尺度の関係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 73 卷第 4 期（2015 年 3 月），頁 39-70。

⁶ 李磊：〈「肇構神京」與「締我宋宇」：劉宋的王畿設置與疆域界定〉，《社會科學》第 9 期（2018 年 9 月），頁 165-173。

朝對北朝宣示正統的一貫傳統，同時也必須隨時因應來自北朝的挑戰，不斷創造諸般制度、象徵與話語。另一方面，他一如其祖劉裕，地位不高，卻承運而起，而必須處理來自內部的反對勢力。

不同於歷史學者從實際的制度或空間入手，田曉菲則指出，有別於北朝，南朝乃是文字和文本的帝國，試圖從劉宋王朝君主如何藉由物質和文字的雙重層面，將「地促不如中國」的江左，營造為江南佳麗地，也把建康營造為金陵帝王州。⁷然而此文主要是以宋文帝為中心，依據辭賦創作而展開的論述。

本文擬同時透過劉宋與北魏雙方的歷史書寫，兼及相關文書與文學作品，探討孝武帝劉駿的書寫，如何受讖、刊定內亂與收復失土，疊映其祖宋武帝劉裕（363-420）的身影；另一方面，分析他如何改變了宋、魏軍事征伐對抗模式，轉而致力於復禮輯樂與文學競爭，在在透過「文」的實踐，轉化南朝帝王的形象，從而締造嶄新的「大宋」風貌，並接續至整個南朝尚文的文化氛圍。凡此又與北朝產生怎麼樣的運動？也是論述的關懷所在。

二、宋武與孝武帝形象的疊映

惟天有命，眷求上哲。赫矣聖武，撫運桓撥。
功並敷土，道均汝墳。止戈曰武，經緯稱文。
鳥龍失紀，雲火代名。受終改物，作我宋京。
至道惟王，大業有劭。降德兆民，升歌清廟。——王韶之〈高祖武皇帝歌〉⁸

魏晉南朝王朝的建立，相對於湯武革命，乃至後世的改朝換代，皇帝權力的來

⁷ 田曉菲著，何維剛、雷之波譯：〈南朝宮廷詩歌裏的王權再現與帝國想像〉，《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30卷第1期（2020年3月），頁142、147。Tian Xiao Fei, "Representing Kingship and Imagining Empire in Southern Dynasties Court Poetry", *T'oung Pao* 102.1.3 (2016), pp. 18-73。該文中文版略有增刪。

⁸ 梁·沈約：《宋書》，卷20，頁580。

源始自君臣間的「禪讓」制度，故必須透過「去臣化」的過程，方能進行新權力的轉移；而權臣則往往以先掌握軍事朝政為起點，而後受封為相國，達到臣的最高層次，再經由勸進、九錫之禮等禮、文的操作，暗促君主賜予權臣大位，以完成統治交替。⁹在此過程中，實包括了內外征戰、禮儀實踐，以及各種繁複的官式文書運用，旨在曉以大義、安撫人心，並賦予諸般行動的正當性。劉永中則進一步指出，禪代作為一種制度，包含了「力」、「命」、「禮」這三個議題。「力」指王朝建立者以武力崛起的過程；「命」則是透過天命兆示政權轉移的必要性；而「禮」乃是必須在力與命兩個要素的配合下，透過禮制、典禮宣告禪代的完成。¹⁰由此細讀王韶之(380-453)所作的〈高祖武皇帝登歌〉，為舉行祭祀大典，樂師登堂所奏之歌，代表朝廷對於高祖劉裕(363-422)功業的評價與定位。主要可分兩個部分：一、施行武力，功高天下（「功並敷土，道均汝墳。止戈曰武，經緯稱文。……至道惟王，大業有劭」），也即是所謂「力」的施行；二、天命轉移，受終改運（「惟天有命，眷求上哲。赫矣聖武，撫運桓撥。……受終改物，作我宋京」），即是所謂「命」的用作。而在「禮」的部分，由於劉裕在位不到三年，還來不及制禮，因此該首歌僅用一句「降德兆民，升歌清廟」，以宗廟祭祀的場面簡要帶過。

由此可見，劉裕雖然以力崛起，變革天命，改姓易代，但如何創立新制？仍留下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筆者曾於〈嵩山受璧／長安開霸——劉裕英雄試煉與創業神話敘述〉一文指出，探討劉宋既已建國，然江南道教的諸經中，興復漢世的劉氏之讖依然紛起，要探究此一現象就必須跳出救劫真君與神秘年的固定指涉，考慮南朝與北魏間持續百年的戰爭。¹¹換言之，宋文帝劉義隆(407-453)與太武帝拓跋燾(408-452)在位期間的文攻武犯，可謂兩國交戰最劇烈的時期，不僅因北魏乘劉裕過世之機，大舉南侵，奪取包括虎牢（今河南滎陽汜水鎮）、洛陽及滑臺（今河南滑

⁹ 徐沖：《漢魏革命再研究：君臣關係與歷史書寫》（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朱子彥：〈易代鼎革：九錫與禪讓制度〉，頁1-61。

¹⁰ 見劉永中：《魏晉南朝禪代研究：以「力」、「命」、「禮」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頁2。

¹¹ 劉宛如：〈嵩山受璧／長安開霸——劉裕英雄試煉與創業神話敘述〉，《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第10期（2018年1月），頁87-123。

縣)等黃河以南土地；¹²是以劉義隆亟想收復河南地，一共發動三次北伐。另一方面，當時北方高道寇謙之(365-448)也以「中嶽靈瑞」，醞釀一場道教化政治大秀，寇氏本人在神瑞2年(415)聲稱太上老君授予天師之位，以及《雲中音誦新科之誠》20卷；緊接著在泰常8年(423)，上師李譜文賜《天中三真太文錄》，以便勅召百神；而拓跋燾在太平真君19年(442)至道壇，親受符籙，備置法駕，旗幟盡青，¹³意在反擊佛教對劉宋政權的支持。¹⁴而南方則同樣標舉道經神話，諸如九尾狐至、庭降甘露等祥瑞，以及新出《太上洞淵神咒經》、¹⁵《三天內解經》¹⁶等，反覆強調劉氏政權與道教圖籙的關係，賦予劉裕西征大業具有緬懷與期待的褒揚之意，同時也彰顯南方政權的正統性，寄寓在整軍經武之後，期待即將到來的「甲午」年(454?)重返長安(失土？)。

符讖作為一種能指的符號，具有多重詮釋的可能性，特別是中國文字既是形符，

¹² 「初虜自河北之敗，請修和親；及聞高祖崩，因復侵擾，河、洛之地騷然矣。」梁·沈約：《宋書》，卷4，頁64。

¹³ 「太平真君三年春正月甲申」北齊·魏收：《魏書》，卷4上，頁94。

¹⁴ 姜望來：〈皇權象徵與信仰競爭：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1輯，(2015年7月)，頁110-125。

¹⁵ 〈誓魔品〉曰：「及漢魏末時，人民流移，其死亦半。至劉氏五世，子孫紹其先基。爾時四方盪盪，危殆天下，人民悉不安居，為六夷驅逼，逃竄江左。人氏隱跡，亦避地淮海。至甲午之年，人氏還住中國，長安開霸，秦川大樂。六夷賓服，悉居山藪，不在中川。道法盛矣。『木子』、『弓口』，當復起焉。」晉·王纂授：《太上洞淵神咒經》，收入明·張宇初、邵以正、張國祥編纂：《正統道藏·洞玄部》第1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卷1，頁232-233。該書著錄晉道士王纂稱太上道君降授，前5卷約成書於東晉末劉宋初。原書10卷，有敦煌唐寫本，寫於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另有《正統道藏》本20卷，其前10卷為六朝古本，後10卷為中晚唐道士增補，收入洞玄部本文類。〔日〕吉岡義豐：〈六朝の圖讖道經——太上洞淵神咒經について〉，《道教經典史論》(東京：五月書房，1988年)，頁154-211；〔日〕大淵忍爾：〈洞淵神咒經の成立〉，《道教史的研究》(岡山：岡山大學共濟會，1964年)，頁477-479；〔日〕小林正美：〈《太上洞淵神咒經》と《女青鬼律》と《太上正一呪鬼經》の成書年代について〉，《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90年)，頁367-381；中譯本可參考李慶譯：〈關於《太上洞淵神咒經》、《女青鬼律》和《太上正一呪鬼經》的成書年代〉，《六朝道教史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52-365。

¹⁶ 《三天內解經》卷上：「劉氏之胤，有道之體，絕而更續，天授應圖。中嶽靈瑞，三十二璧，黃金一餅，證之本姓。九尾狐至，靈寶出世，甘露降庭，……治正以道，蕩除故氣，此豈非太上之信乎？宋帝劉氏是漢之苗胄，恒使與道結緣，宋國有道多矣。」，晉·王纂授：《三天內解經》，收入明·張宇初、邵以正、張國祥編纂：《正統道藏·洞玄部》第876冊，卷上，頁9。

也是音符，可以巧用形近、音近，乃至意義轉譯來契合讖記謠詞。可惜元嘉 28 年（451 年）至元嘉 30 年（453 年）連續幾次的天象變異，隨後文帝即遭太子劉劭所弑，此一期待究竟將如何變化？本文將此一討論延續至劉駿的政治操作。

（一）真人應符

在文帝劉義隆的諸子中，三子劉駿（430-464）儘管「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¹⁷卻不得寵，即如《宋書》所載：「世祖（劉駿）不見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京輦」，¹⁸他從七歲受封為武陵王；十歲起陸續外鎮湘州，又轉南豫、豫、司、雍五州，後加秦州，後改任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襄陽、竟陵、南陽、順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甯蠻校尉、雍州刺史；十八歲則改任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持節如故，北鎮彭城，又加任兗州刺史。在其現存詩歌中，作於元嘉時期的六首詩歌，包括〈登作樂山詩〉、〈登魯山詩〉、〈曲阿後湖詩〉、〈與廬陵王少紹別詩〉、〈拜衡陽文王義季墓詩〉和〈北伐詩〉等，多為外鎮行役觀覽之作，其中〈登作樂山〉云：「修路軫孤轡，竦石頓飛轅。遂登千尋首，表裡望丘原。屯煙擾風穴，積水溺雲根。漢潦吐新波，楚山帶舊苑。壞草凌故國，拱木秀頽垣。目極情無留，客思空已繁。」¹⁹該詩應作於元嘉 22 年（445）正月至 25 年（448）四月鎮守襄陽期間，寫景嵌奇磊落，氣勢雄渾，諸如丘原之望、屯煙之景，將其心緒寓於景象中；尤其舊苑、故國及頽垣的殘破圖像，其景雖無情而觀者則有感，故王夫之《古詩選評》評為「得之於悲壯而不疏不野，大有英雄之氣。」²⁰另外還有一些年代較難確定的作品，則重在抒情，如〈離合詩〉、²¹〈七夕詩〉二首，卻可見其長期外放的心態，特別是後者，

¹⁷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 2，頁 55。

¹⁸ 梁·沈約：《宋書》，卷 71，頁 1848；〈徐湛之傳〉又曰：「南平王礪、建平王宏並為上所愛，而鑠妃即湛妹，勸上立之。」，卷 72，頁 1858。〈建平王宏傳〉則曰：「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卷 72，頁 1858。

¹⁹ 遼欽立：《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宋詩》（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卷 5，頁 1220。

²⁰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第 2 冊，（長沙：嶽麓書局，2011 年），頁 749。

²¹ 王坤：《劉駿年譜》訂為「元嘉 28 年三月戊申劉駿進督南兗州，由徐州刺史改南兗州刺史，鎮山陽」所作，主要從仲秋守邊的時序，以及「悲客他方」的詩意立論。王坤：《劉駿年譜》（上海：上海師

其曰：「秋風發離願，明月照雙心。偕歌亦遺調，別歎無殘音。開庭鏡天路，餘光不可臨。沿風披弱縷，迎輝貫玄針。斯藝²²成無取，時物²³聊可尋。」²⁴該詩抒寫牛郎織女短暫相聚，而後愈添深長的思念與無奈，述說著照亮天路的月光將盡之嘆，並藉織女典故象其披光之弱，民俗中的月下穿針，但迎餘暉，即以織藝喻指文藝，將此一詩歌視為薄藝，雖已賦成，實無可取，藉此傳達衷心遺憾，其中寓含孤臣孽子面對疏遠和分離的傷心之情，旨趣昭然若揭。²⁵

在劉宋北伐的政治展演中，劉駿不斷參與演出，從元嘉 18 年（441）開始，至 29 年（452），從出鎮各地屢獻祥瑞，如木連理、白虎、甘露、六足獐、白雉、白鹿等，多達十次，亟欲以符圖應。²⁶此外他在〈北伐詩〉則曰：「表裏跨原隰，左右禦川梁。月羽皎素魄，皇旗旆赤光。」²⁷全詩雖似寫景，但筆勢遼遠而雄偉壯闊，赤白交映而氛圍肅穆。換言之，劉駿對於父親的北伐行動，不僅屢屢透過上呈諸般祥瑞，以期堅定此一舉動，同時也一再親與戰場，²⁸故以詩篇極寫軍容之盛，展現宋軍蓄勢待發的氣象。可惜劉義隆三次北伐都是以失敗告終，甚至遭到拓跋燾輕蔑以待，在

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3 年），頁 56。

²² 宋·李昉等編撰：《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卷 31，頁 279，「時序部」引作「薄藝」。

²³ 宋·李昉等編撰：《太平御覽》，卷 31，頁 279，引作「時務」。

²⁴ 遼欽立：《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宋詩》，卷 5，頁 1222。

²⁵ 〈鮑照傳〉記載：「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這種與臣下爭勝的心態，實與當時以文藝為薄藝，亟欲在時務上有所作為的心態不同。見梁·沈約：《宋書》，卷 51，頁 1480。

²⁶ 分見梁·沈約：《宋書·符瑞中》，卷 28「白鹿」，頁 805-806；「白虎」，頁 808；「白驥」，頁 810；「甘露」，頁 819-820；「木連理」，頁 857-858；「白雉」，頁 864。又，「毛蟲之孽」：「宋文帝元嘉 24 年二月，雍州送六足驥，刺史武陵王表為祥瑞。此毛蟲之孽。」，頁 922。

²⁷ 遼欽立：《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宋詩》，卷 5，頁 1223。

²⁸ 在與北魏的戰爭中，元嘉 27 年（450 年）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率軍南侵劉宋，劉駿接詔後，領 1500 兵馬進襲汝陽，魏軍因無防備而潰敗。宋軍殺北魏軍三千餘人，燒其輜重，營救大批被魏軍擄掠的宋民。然後來魏軍探得宋軍後無援軍，便從虎牢引救兵反撲，宋軍兵力不足而戰敗。劉駿先勝後敗，由安北將軍被降號為鎮軍將軍。梁·沈約：《宋書·索虜傳》，卷 95，頁 2344-2345。同年文帝大舉北伐，魏軍南下反攻，兵分四路驅入劉宋境內，兵鋒直指長江北岸。彭城的宋統帥劉義恭準備出城南逃，張暢與劉駿力主堅守彭城，與北魏展開一場精彩的外交戰。詳參劉苑如：〈酒瀆之贈：宋魏征戰的犒勞遊戲〉，《桃の会論集九集——小南一郎先生傘壽記念論集》（京都：桃の会，2024 年），頁 73-88。

國書中被嘲謔為「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²⁹反倒は劉駿在誅除弑父自立的兄長劉劭後，意外地繼承大統，從武帝—少帝—文帝—劉劭—孝武帝，誠如《太上洞淵神咒經》所言：「至劉氏五世，子孫紹其先基」，正可對應為劉宋朝的第五位皇帝，³⁰似乎更有應讖的可能性。

這種變化驟視似乎突然，實則還是有跡可尋。劉駿在位時間（453-464）正好與魏文成帝拓跋濬（440-465）在位（452-465）期間大抵相仿，根據《資治通鑑》記載：「初，魏世祖（拓拔燾）經營四方，國頗耗虛，重以內難（元·胡三省注：內難，謂宗愛既弑世祖，又弑南安王余），朝野楚楚。高宗（拓跋濬）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³¹原來拓跋濬曾遭逢政變，其祖、叔先後被中常侍宗愛弑殺，而以幼君即位，又缺乏有力的支持者，³²故最需安定民心，在平定內亂之後，既要休養生息，尤需王命的合法性，即如《魏書·高宗本紀》興光元年（454）所記：「二月甲午，帝至道壇，登受圖籙」，³³仿效其祖拓跋燾登道壇、受符籙，藉由天命穩定內外政局。相對的，在南方的劉宋政權也發生繼承問題，事起於北伐意見的衝突，特別在元嘉27年（450）失敗後，太子劉劭就與文帝及其寵臣江湛的關係非常緊張，直至29年（452）七月嚴道育巫蠱案被揭露後，即有廢黜太子，及賜死次子劉濬（429-453）之意。³⁴然而在新立太子人選上又產生分歧：文帝欲立建平王劉宏（434-458），徐湛之支援女婿隨王劉誕（433-459），江湛則支持妹夫南平王劉鑠（431-453）。³⁵唯排行在劉劭、劉濬之後的武陵王劉駿，素不得寵，故被排除在太子人選之外。然在他龍飛之前，曾得沙門僧含「真人應符」之讖記，《宋書·傳》即曰：

初，沙門釋僧含粗有學義，謂竣曰：「貧道粗見讖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

²⁹ 梁·沈約：《宋書》，卷95，頁2374。

³⁰ 有關宋孝武帝與道教的關係，非本文重點，在此不詳論，可參見林飛飛：〈孝武帝與道教〉，《劉宋帝王與宗教關係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專門史博士論文，2013年），頁197-199。

³¹ 宋·司馬光，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平：古籍出版社，1956年），卷103，頁4073。

³² 有關北魏成文帝拓跋濬的繼承過程，可參見羅文星：〈北魏太宗、世祖朝的繼承問題與政局〉，《成大歷史學報》第53號（2017年12月），頁1-51。

³³ 北齊·魏收：《魏書》，卷5，頁113。

³⁴ 梁·沈約：《宋書·二凶》，卷99，頁2423-2439。

³⁵ 梁·沈約：《宋書·王僧綽傳》，卷71，頁1850-1851。

第，屬在殿下。」竣在彭城嘗向親人敍之，言遂宣佈，聞於太祖。時元兇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治。³⁶

而稍後慧皎（497-554）《高僧傳·僧含傳》則更能以後見之明，宣稱「讖諱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其載曰：

瑯琊顏竣時為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鎮潯陽，與含深相器重，造必終日。含嘗密謂竣曰：「如令讖諱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兇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³⁷

顏竣（？-459）歷任劉駿軍府主簿，深得其親近禮遇。《魏書》則稱「駿諮議參軍顏竣，專主軍謀」，³⁸在這場劉宋王室繼承戰中，不會坐視而無所作為。根據《宋書·文帝紀》：「元嘉 28 年六月壬戌，以北中郎將武陵王駿為江州刺史」，³⁹可見顏竣與僧含相交也應不早於此時，正是王室禍亂將起之際。儘管讖記的確切內容，難以詳悉，而依據僧俗所記的意圖異中有同，僧含既要求顏竣緘默守密，顏氏反而大肆宣傳，強調劉駿乃是「真人應符」者，甚至此一風聲傳至宋文帝的聽聞，勢必造成某種輿論，使得生性慈愛的文帝也不得不考慮採取收治行動，以免影響既定的繼承規劃。而「名稱次第」的排行之秘，亦即從繼統順序和兄弟排行，宣稱劉駿當王的正當性，就在符應該當其序。雖然他所得到的實際幫助，來自叔父南譙王劉義宣（415-454）、其弟劉誕等皇族宗室，另一位叔父江夏王劉義恭（413-465）更直接「奉表上尊號」。此一情勢的形成，固肇因誅除劉劭、劉濬大逆的正義考量，而原本不被看重、也無權貴支持的皇子，卻能在四海無統的情況下順利出線，實不宜忽略讖記的微妙作用，在關鍵時刻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⁴⁰

繼劉宋武帝劉裕借用佛教讖記作為繼承政權正統，劉駿無疑師承了先祖劉裕的

³⁶ 梁·沈約：《宋書·顏竣傳》，卷 75，頁 1959-1960。

³⁷ 梁·慧皎：〈釋僧含〉，《高僧傳》，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卷 7，頁 370。

³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 97，頁 2142。

³⁹ 梁·沈約：《宋書》，卷 5，頁 100。

⁴⁰ 〈元兇劭傳〉記劉濬兵敗出奔，在越城遇江夏王劉義恭，義恭曰：「四海無統，百司固請，上已俯順群心，君臨萬國。」見梁·沈約：《宋書》，卷 59，頁 2434。

遺緒，再次利用謠讖為其王權之合法性、神聖性，提供有力的論證。甚且比劉裕當初還要慧義前往嵩山印證，更加直接大膽，甘冒被治罪的風險。然適逢劉劭巫蠱事發，正暗示著此一湊巧的符應，促使眾人不得不重新考慮劉駿繼承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宋書·符瑞志上》亦記載曰：「文帝元嘉中，謠言錢唐當出天子，乃於錢唐置戍軍以防之。其後孝武帝即大位於新亭寺之禪堂。『禪』之與『錢』音相近也。」⁴¹劉駿既以起兵討伐弑父凶逆，得以登上帝位，然更值得注意的是選擇在新亭寺的禪堂即位，並改新亭為中興亭。歷來學者對此一現象都頗為重視，鐸田茂雄指出，其目的與武帝雷同，都是利用佛教祥瑞做了天子，因而被視為奉佛天子；⁴²林飛飛亦從禪堂即位，以應謠讖立論。⁴³嚴耀中則認為此為寺院的官方化，作為執行禮制的場地。⁴⁴凡此皆有所見，而其最根本的原因，或許應考慮劉駿即使已有「真人符應」之讖，但更早即流傳著「錢唐當出天子」之謠，劉駿的正統性尚有不能完全服眾之處，於是改錢唐為禪堂，透過音相近的新亭寺禪堂即位來應讖，再次證明天命所歸。

（二）刊定四海

四海作為地理名稱，歷代所指不同，《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用邊境民族作為四海的邊境；《河圖括地象》則曰：「夏禹所治四海」，以皇權所及的區域作為範圍。特別在魏晉南北朝分裂的時代，治權所至之地即可視為四海。

由於符讖的多重詮釋性，常被不同陣營的有心人士利用操作，而使當權者衍生出多方疑慮。從（軍）力的角度來說，劉駿的崛起，與元嘉 22 年（445）受命出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屢有軍功有關；而此一襄陽雍州軍力，後來成為其奪取皇位強大的軍事後盾。⁴⁵從（天）命的角度觀之，劉氏之讖既還是進行中、尚未完成的讖

⁴¹ 梁·沈約：《宋書》，卷 27，頁 786。

⁴² [日]鐸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高雄：佛光出版社，1985 年），頁 119。

⁴³ 林飛飛：《劉宋帝王與宗教關係》，頁 153-154。

⁴⁴ 嚴耀中：〈佛教型態的演變與中國社會〉，《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2 期（2001 年 3 月），頁 35。

⁴⁵ 參見何德章：〈宋孝武帝上臺語南朝寒人之得勢〉，《魏晉南北朝史叢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語，相對來說，「錢唐出天子」則為更加明確的指標。儘管劉駿原本完全與錢塘毫無關係，於是一方面用透過音近的詮釋來趨近符指；另一方面加速切斷當時其他可能的意指。錢唐縣的地理位置，最早見於記載的為南朝劉道真所著《錢唐記》，其曰：「昔縣境逼近江流，縣在靈隱山下，至今基址猶在」。⁴⁶在文帝時期，則屬於吳郡太守、揚州刺史治下。而元嘉中以後，先後任職揚州刺史者，計有彭城王劉義康（409-451，元嘉9年六月至17年十月）、殷景仁（390-441，元嘉17年十至十一月）、始興王劉濬（429-453，元嘉17年十二月至26年十月）、廬陵王劉紹（432-452，元嘉26年十月至29年十一月）、南譙王劉義宣（元嘉30年正月，未及就任）。⁴⁷其中劉義康就曾被其黨眾試圖推上帝位，又涉孔熙先謀反之事，終被文帝賜死；殷景仁和劉紹早逝；劉濬涉巫蠱案被殺。當時唯尚未就任的劉義宣仍在世，但由於他在得知劉劭變亂後即起兵討伐，並徵集士卒，傳檄遠近，還派了參軍徐遺寶率三千兵支持劉駿，作為前鋒。因此劉駿即位後，便任命義宣為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並賜班劍四十人，改封為南郡王，食邑萬戶。⁴⁸值得玩味的是，義宣卻辭讓內任揚州、錄尚書六條事及兒子的進爵。義宣長年鎮守位居上流軍勢的荊州，自然不需要淌此渾水，觸及「錢唐出天子」之謠的雙刃性，故拒不受揚州刺史一職。

儘管如此，義宣主掌荊州十年，專橫跋扈，又與甚有野心的臧質關係甚密，既是表兄弟，又是兒女親家，於是在臧質的慫恿下，仗恃著「天子氣」，約定於孝建元年（454年）秋季一同舉兵。⁴⁹劉駿當時即位還不及一年，聞聽荊州、江州、兗州、豫州四州同叛，大為驚慌，甚至興起投降讓位的打算。所幸竟陵王劉誕極力反對，方才堅定了劉駿平叛的決心，⁵⁰最後終於順利括清一大隱憂，自然要豎旗祭祖，感謝

年），頁42。

⁴⁶ 宋·李昉等奉敕傳：〈江南道上·杭州〉，《太平御覽·州郡部》，卷170，頁957，引劉道真《錢唐記》。

⁴⁷ 梁·沈約：《宋書》，卷5，頁80-102。

⁴⁸ 梁·沈約：《宋書》，卷68，頁1799。

⁴⁹ 梁·沈約：《宋書》，卷68，頁1800。

⁵⁰ 梁·沈約：《宋書》，卷79，頁2026。

天恩。史載「孝建元年，世祖率群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⁵¹《高僧傳·竺法義傳》也指出：孝武帝「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為開拓，改曰中興。」，⁵²原本應是為紀念文帝，故在中興寺設齋祈福，而後又有所擴建，竟也成為了義宣冤魂作福之地，事見《高僧傳·求那跋陀羅傳》，其曰：

初跋陀在荊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

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為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為開三間房。⁵³

但凡觸犯罪惡、背叛親情、未被寬恕，即會形成罪負感，隨之則可能陷於鬼魂陰影中。反之，若亡靈可得表白、或採取宗教儀式得以化解，則大有助於安定苦魂。儘管劉駿允諾跋陀為義宣焚香三年，或可超渡亡魂；但讖謠中的幽靈，卻無法祛魅而一勞永逸，即使劉駿嘗試使用更名方式，標以「中興寺」的光明意象，以期解除「揚州」之謠的幽靈，卻仍無法回應隱匿的自身。在〈齋中望月詩〉曾詠其情：「褰幕蕩暄氣，入夜漸流清。微微風始發，曖曖月初明。思因往物深，悲以歸雲盈。」⁵⁴即抒寫往物之思既深，斯悲則有如歸雲，隱約掩映於月、雲之中，過往記憶既已飄忽模糊，卻仍噬咬其心，正可見此一詩中寓意誠深。

隨著劉誕先有舉兵討元兇之捷，又有平定義宣之勳，孝武帝劉駿一方面予以恩寵，「以誕為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⁵⁵另一方面再次猜忌，「錢唐出天子」之謠的利刃又轉向劉誕。魯力曾分析孝武帝、劉誕、雍州將領三者間的關係，他指出：孝武帝所能依靠的武力只有雍州將領，而這些人亦曾為劉誕部下，隨時可以重演應讖舉兵的戲碼，是以孝武帝始終不能完全放心。⁵⁶

⁵¹ 梁·沈約：《宋書》，卷 89，頁 2229。

⁵² 梁·慧皎：〈竺法義傳〉，《高僧傳》，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卷 4，頁 351。

⁵³ 梁·慧皎：〈求那跋陀羅傳〉，《高僧傳》，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卷 3，頁 334。

⁵⁴ 遼欽立：《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宋詩》，卷 5，頁 1223。

⁵⁵ 梁·沈約：《宋書》，卷 79，頁 2026。

⁵⁶ 參見魯力：〈孝武帝誅竟陵王事與劉宋宗王鎮邊問題〉，《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3 卷第 5 期（2000 年 9 月），頁 624。

因此平叛不久，即令劉誕出鎮京口；又「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而轉遷於廣陵，並違背武帝遺詔，以劉延孫據京口以防誕，另則是將揚州統轄的六郡設為王畿，東揚州為揚州。⁵⁷然他仍覺不快，必欲除之，乃令垣閻偷襲廣陵。事既不成，遂命沈慶之公開討伐劉誕，終於在大明3年（459）七月攻克廣陵，隨後遇害。⁵⁸隔年孝武帝又在中興寺設齋，忽見有一異僧，自言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乃改中興為天安寺。⁵⁹這無疑又是藉命名神話，展現皇權的方式。而「天安」一詞，誠道盡一位不安天子對於「天安」的期待，以及對刊定四海的歡慶之情。

在安內的同時，亦得觀察劉宋與北魏的對峙情況。劉駿與魏文成帝拓跋濬在位期間相近，雙方戰事相對為少。然在大明2年（458）青州之戰，一舉收復了濟水北岸的土地。⁶⁰事起於同年四月，劉駿派積射將軍殷孝祖在清水（濟水下游）東岸（滑台附近）建築兩座城池。北魏認為威脅到了其南部邊境。文成帝拓跋濬派天水公封敕文和隴西王源賀率軍侵犯劉宋的青州，又使窟壞公、五軍公等率馬、步軍數萬人渡過黃河下游的濟水，企圖攻佔劉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州等地。青、兗二州告急，劉駿乃以顏師伯為青州刺史，調左軍將軍崔道固、右衛將軍垣護之、屯騎校尉龐孟虯與殷孝祖等趕赴前線，後又派遣司空參軍卜天生率領後軍與顏師伯等人會師，一起抗擊魏軍。顏師伯一月之內四戰四捷，斬殺北魏大將樹蘭、窟壞公、五軍公等人，擊潰魏軍，封敕文大敗，向北魏朝廷求援。

十一月，北魏派遣徵西大將軍皮豹子與諸將率騎兵三萬援助封敕文，顏師伯統軍奮力抵抗，皮豹子被顏師伯的參軍焦度刺中，墜馬出逃。其殘軍繞道攻進劉宋高平郡附近的垣苗寨，又久攻不克。與此同時，卜天生、殷孝祖等宋軍將領又率軍擊潰清水方向的魏將張懷之、源賀，封敕文等狼狽逃走。魏軍全線潰敗，皮豹子也從高平撤軍。宋軍乘勝追擊，接連收復杜梁、申城、臨邑、糜溝等在元嘉北伐期間被

⁵⁷ 梁·沈約：《宋書》，卷6，頁123。

⁵⁸ 梁·沈約：《宋書》，卷79，頁2026-2028。

⁵⁹ 梁·沈約：《宋書》，卷97，頁2392。

⁶⁰ 梁·沈約：《宋書》，卷77，頁1993-1994。亦見梁·慧皎：〈宋京師中興寺道溫傳〉，《高僧傳》，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卷7，頁372。

北魏侵佔的濟水北岸的城池，宋軍將魏軍趕回了黃河下游的北岸。魏軍撤軍途中，投河淹死的士兵不計其數。劉駿聽聞前線戰報大喜，下詔嘉獎前線宋軍戰功。

即使根據《魏書·高宗紀》記載，皮豹子「略地至高平，大破孝祖，斬獲五千餘」，⁶¹可見亦有損失。然宋軍自從元嘉北伐失敗後，少有屢敗魏軍的紀錄，更別說收復失土。再則，大明4年（460）三月，北魏寇北陰平孔堤，太守楊歸子亦予以擊破，⁶²又添一勝。儘管李磊認為孝武帝與北魏的戰爭意在保境，即便是過河「耀威」，終需要回返，與宋文帝積極北伐的態度迥然不同。⁶³然而凡此在劉宋立國期間的軍事成就中，都佔有不可磨滅的象徵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宋書·禮制三》記載，宋文帝劉義隆向有泰山封禪之意，惜與北魏戰爭不力而不得不放棄，成為劉宋臣民共同的遺憾；孝武帝劉駿在締基繼業之後，劉義恭乃於大明元年十一月上〈請封禪表〉，請封禪泰山，劉駿大悅，詔答：「庶仰述先志，拓清中宇，禮祇謁神，朕將試哉。」大有收復青州，完成封禪大業的意圖。是以一旦與北魏的戰爭有進展，徐爰又在大明4年四月又《封禪儀注》，在其奏議中盛稱：「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闈，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絕，拘采遺文，辯明訓誥，□□□□，籩訪鄒、魯，草牋書堙玉之禮，具竦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鑄璽乾封。懼弗軌屬上徽，輝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極稱聖世，陳列祥瑞，並重申弘揚舊典遺文的必要性，再次請封禪，劉駿卻下詔辭曰：「天生神物，昔王稱愧，況在寡德，敢當鴻覲。今文軌未一，可停此奏。」⁶⁴可見劉駿一方面完成國內戡亂之大業，另一方面亦承續父祖，抱有「拓清中宇」之志。

綜言之，若說武帝承受天命，撫運撥亂，以武經緯天下，利用巫筮、讖緯之術以神化劉裕，以提升其聲望，為其代晉製造輿論；而孝武帝則因時際會，踵武高祖，同樣利用真人符應即位，繼而刊定內亂，雖然只是恢復了部分失土，而後諡號為「孝武」，既有繼承祖業，中興衰世之意，亦可見疊映了宋武帝的身影。然而歷經南北長

⁶¹ 北齊·魏收：《魏書》，卷5，頁117。

⁶² 梁·沈約：《宋書》，卷6，頁125。

⁶³ 李磊：〈「肇構神京」與「締我宋宇」：劉宋的王畿設置與疆域界定〉，頁165-173。

⁶⁴ 梁·沈約：《宋書》，卷16，頁442-443。

期的交鋒，劉駿終究明白只能與北魏對峙保境，無法改變「文軌未一」的現實，如何在對立中掌握南朝優勢，建立劉宋正統的話語，則是這位帝王面臨的新挑戰。

三、劉宋帝國形象的建立與轉化

門下：朕震武撥亂，創復洪績，帝有天下，五載於茲，……昧旦思化，旰時詳刑，蠲苛存隱，去煩即簡，諒以無替朕心，深詔執事者矣。頃龍鳳庶靈，屢表天貺，泉河眾瑞，頻彰寒□。歲稔不御，榮辱斯辯。廟樂事光，國文畢舉，區外弭塵，海內安波。寔祖宗遺慶，豈予子臻。……改孝建四年為大明元年。——宋孝武帝〈宋孝武帝改元大赦詔〉⁶⁵

魏晉南北朝雖然是朝代更迭，弑篡屢見的時期，卻是中國禮儀制度的重要發展階段，以五禮為架構，後來成為隋唐禮儀學的源頭，確立中古禮儀的基本架構。⁶⁶梁滿倉研究則指出，當時五禮不僅僅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實踐；既是對秦漢時期禮的繼承，以師古創造權威性和神聖性，同時每個皇朝各有差異，具有不斷變化的時代內容及特點。⁶⁷

劉駿〈宋孝武帝改元大赦詔〉一文，主要以四字句對偶的句式，歷述其即位後，在震武撥亂後，力圖作為，所謂「昧旦思化，旰時詳刑，蠲苛存隱，去煩即簡」，意指尊崇孔子、重農舉才、倡導節儉、宥罪聽訟、開放苑禁、西堂受奏事等平冤便民措施。而更受學者注意的，則在「廟樂事光，國文畢舉」，也即是巡狩省方、詔祀郊廟、議郊廟舞樂、親祠南郊等禮樂實踐，以及多次親自召集宴集賦詩。換言之，透過禮樂文學的建置創作，他認為將劉宋王朝從中衰亂世，振衰起蔽，足以開啟「大明」的新紀元。

相對來說，北魏文成帝年僅十二歲即位，執政初期內亂頻起，因而減少南侵，

⁶⁵ 唐·許敬宗編，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336。

⁶⁶ 陳寅恪：《陳寅恪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13。

⁶⁷ 梁滿倉：《魏晉南北朝五禮制度考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126-176。

但在一統北方的步調，卻沒有停息，特別是對宿敵柔然。太安 4 年（458 年），拓跋濬親率 10 萬騎兵、15 萬輛戰車，進攻柔然。柔然處羅可汗吐賀真因而遠逃；柔然別部統帥烏朱駕頽等人亦率領數千帳幕所聚的部落投降。⁶⁸此後隨著北魏政治的轉化，雙方緩和的趨勢開始上升，和平通使的次數漸次增加，而征戰則越來越少。⁶⁹另一方面，即使以馬上武功一統北方的拓拔王朝，隨著政權逐步穩定，也必須修禮正樂，誠如文成帝和平 6 年（465），刁雍曾上〈興禮樂表〉曰：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禮樂為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脩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臣今以為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頌之饗，良由禮樂不興，王政有缺所致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儒先，管窺不遠，謂宜脩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⁷⁰

該表一方面指出當時北魏尚且禮樂不修的情況，但另一方面由文成帝立即詔令公卿集議，足見北朝帝王已經逐步開始接受禮樂治國的想法，並試圖有所作為，乃為後來孝文帝落實五禮制度，奠定了觀念上的基礎。

茲此，原本在軍事上居於弱勢的劉宋，即使在軍事上常用積極聯絡柔然、胡夏、北燕、高句麗、吐谷渾的方式，試圖展開對北魏包夾圍攻，其中與柔然的聯盟關係最穩固也最持久。⁷¹然隨著北魏以優越軍力個個擊破，要乘亂反擊的機會越來越少。誠如前引戶川貴行到李磊等學者的意見，劉宋若要與北魏分庭抗禮，宣稱自己的正統性，已經不能再依靠動用武力，而必須憑藉禮制改革與政治操作，諸如設玉畿、立明堂、造五輅、南巡霍山，乃至在國家禮儀中導入民間音樂，取消祭天與祭祖樂曲嚴格區分的理念，並進一步將民間音樂應用於南郊，又以鞞、拂、雜舞合之鍾石，

⁶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 106，頁 2295。

⁶⁹ 參見張金龍：〈北魏中後期的北邊防務及其與柔然的和戰關係〉，《西北民族研究》第 2 期（1992 年 12 月），頁 49-63。

⁷⁰ 北齊·魏收：《魏書》，卷 38，頁 870。

⁷¹ 梁·沈約：《宋書》，卷 95，頁 2375。參見周松：〈柔然與南朝關係探略〉，《青海民族學院（社會科學版）》第 26 卷第 2 期（2000 年 4 月），頁 44-50。

施於殿庭，朝會用樂，則兼奏之，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國家儀禮等系列措施，論述精彩，本文無意再重複論述，唯在復禮輯樂和大明文學的框架下，必須將時間再往前推，針對文帝改謚、兼重國學與文學兩個面向，展開一些不同的論述。

(一) 文帝改謚

儘管一個朝代的安定，必須奠定於社會生產、經濟文化和外交關係等全方位的發展，然在《南史·宋文帝紀》卻將元嘉之治，繫於元嘉 14 年（437）之末，其曰：

是歲，武都、河南、林邑、高麗等國並遣使朝貢。上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⁷²

雖然在首尾也談及周邊關係和政化之效，但其敘述的重點，還是放在「上好儒雅」，以及開設四學的措施，將元嘉之治的成就歸結於江左風俗之美。相對來說，這位儒雅的君主在〈與群臣詔〉的自述，則更耐人尋味。劉義隆說道：

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遊玄翫采，未能息卷。自縷綻世務，情兼家國，徒存日昃，終有慚德。而區宇未一，師鋒代有，永言斯瘼，彌千其慮。加疲疾稍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事而廢。殘虐遊魂，齊民塗炭，乃眷北顧，無忘弘拯。思總群謀，掃清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韻。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⁷³

此詔一開頭就言及對文義遊談的好尚，可見在文帝劉義隆自我的認知中，即認同於南朝以「文」治為主的風尚，然他始終眷顧難忘，纏繞心頭的深重情結，卻在「區宇未一」，亟欲北伐。這並非文帝本身好戰，而是自宋高祖劉裕西征河洛、收略河北、奠祭晉陵，不僅是當時盛事，也成為一種祖宗家法，可謂劉氏王朝的正當性所在。因此，即使劉裕已離世多年，宋文帝在取得文治成果之際，即欲重振父輩雄風。於是既以「情深」召喚，並以「義篤」督促，期待群臣響應「掃清逋逆」的軍事行動。

⁷² 唐·李延壽：《南史》，卷 2，頁 45-46。

⁷³ 梁·沈約：《宋書》，卷 95，頁 2341-2342。

然卻無視自己「才謝光武……將非韓（信）、白（起）」⁷⁴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江東忘戰日久，士不習兵」⁷⁵的現實，從元嘉 27 年的〈北伐詔〉即可得知，此時文帝還一味相信「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間使適至……誓為犄角」，⁷⁶將北方成功的希望，寄託在北方漢民的響應，以及北魏宿敵的配合。其結果則如《資治通鑑》所言：

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⁷⁷

從上述青淮人民，不避壯幼，咸遭殺戮的慘狀可知，此次北伐不僅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反而進一步加深了劉宋國內蕭條的政治危機。同時，元嘉北伐也造成了南朝政權正統訴求的轉向，使後繼者孝武帝劉駿意識到隨著北魏的強盛，河南之地不可能被奪取，因此大力發展文化，不再強調中原地域的正統性，轉而強調文化的正統性。

凡此皆已成為學界共同的認知，但孝武帝劉駿的改弦易轍，復禮輯樂的行動一般都認為主要集中於大明之世，不早於孝建年間。事實上，或許應溯源至元嘉 30 年（453）三月癸巳，「世祖踐阼，追改謚及廟號。」⁷⁸《南史》的記載更加明確，其曰：「二月甲子，元凶劭構逆，帝崩於合殿，時年四十七。謚景皇帝，廟號中宗。三月癸巳，葬長寧陵。孝武帝踐阼，追改謚曰文帝，廟號太祖。」⁷⁹赫兆豐已注意到宋孝武帝改文帝「廟號」的舉措，並有細膩的分析。他指出，按禮制「太祖」是後代對本王朝始封之君的特有尊稱，然孝武帝改崇其父文帝「太祖」廟號的行為，既不符合武帝與文帝的客觀地位和歷史功績，也違背了禮制的本義，卻滿足其藉由極力標榜孝道，以建構皇位傳承正統性的目的。⁸⁰基本上，若從目的論來說，此一說法確實

⁷⁴ 梁·沈約：《宋書》，卷 5，頁 103。

⁷⁵ 梁·沈約：《宋書》，卷 100，頁 2446。

⁷⁶ 梁·沈約：《宋書》，卷 95，頁 2348。

⁷⁷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26，頁 3966。

⁷⁸ 梁·沈約：《宋書》，卷 5，頁 102。

⁷⁹ 唐·李延壽：《南史》，卷 2，頁 54。

⁸⁰ 赫兆豐：〈正統的訴求與建構——對劉宋文帝「太祖」廟號的考察〉，《北京社會科學》第 8 期（2017

符合孝武帝即位以來一貫的策略。但赫兆豐將改謚與改廟號視為兩件事，則不太合常情。

謚號既是生者對死者的蓋棺定論，也是來自官方的一種輿論力量，其中所發揮懷念懿行、道德監督的作用，厥為謚禮的要義所在。追尊先祖的謚號並確立廟號，既是祭祀禮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標榜帝王正統的最佳途徑。在此姑且不論作為祭祀的廟號，先從謚號談起。根據蔡邕《獨斷·帝謚》，作為現存最早專門探討帝王謚號的專作，其曰：「致志大圖曰景」。⁸¹劉劭弑父篡位後，謚號為景，實有暗地批評劉義隆好大喜功之意；再證以同書〈元兇劭傳〉卻云：「劭即偽位，……三月，遣大使分行四方……禮官希旨，謚太祖不敢盡美稱，上謚曰中宗景皇帝。」⁸²可見當時禮官揣策劉劭對其父多所不滿，乃有弑殺行為，故不敢給予太多的褒揚。相對於「景」，孝武帝劉駿改謚之「文」，即如《獨斷·帝謚》曰：「經天緯地曰文」，⁸³則寓有孝武帝刻意推尊其父文德，轉化武功失敗的意圖。

若說劉義隆好文義，喜讀書，又能推廣國學，根據《世本·謚法》，在「經緯天地曰文」之外，針對君臣生平德業還有以下不同的指稱，包括：「道德博聞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以及「忠信接禮曰文」⁸⁴等。張守節《史記正義·謚法解》則曰：「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政；「潛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錫民爵位曰文。」與同升。⁸⁵賦予更詳細的詮釋。考察劉義隆的行止似乎也差可相當，只是未論及其功業。若要配合「太祖」廟號，作為王朝始封之君，則「文」的唯一解釋只能是「經緯天地」，方能相當。問題是劉義隆一統區宇壯志未酬，甚至倉皇敗退，如何能配「經緯天地」之謚號？此時重新定義「文」的內涵，改變劉宋以武立國的基調，將禮樂教化、風詠歌謡提升

年8月)，頁28-38。

⁸¹ 漢·蔡邕：《獨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下，頁15。

⁸² 梁·沈約：《宋書》，卷99，頁2428。

⁸³ 漢·蔡邕：《獨斷》，卷下，頁15。

⁸⁴ 漢·宋衷注，清·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卷10，頁367。

⁸⁵ 唐·張守節：《謚法解》，《史記正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19。

至作訓垂範，匡主和民的地位，也就變得異常重要。如此轉變適足以將文帝推尊為「太祖」，取代武帝劉裕的開創地位。

事實上，「文」不僅關乎劉宋一朝的正統地位，也成為南朝共同傳承的文化傳統與政治資源。誠如之前田曉菲所論述，南朝君臣試圖建立一個足以對抗北朝的文字帝國。而《隋書·文學傳敘》曰：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輶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⁸⁶

此論雖距離孝建年間已將近兩百年，已融合了南北雙向的審美理想，標舉出文可「經緯天地」的具體功能。然而更多的時代詮釋與具體實踐，還有待大明以降的展演。

（二）兼重國學與文學

劉宋皇室對文學的雅好，可溯自武帝劉裕。《文心雕龍·時序》即曰：「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⁸⁷劉裕雖出身寒門，發跡於行伍，但畢竟生存在南朝衣冠南渡世族文風下，亦好尚文學，頗慕風流。《宋書·鄭鮮之傳》即曰：「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高祖或有時慚恧，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⁸⁸然在位時間即致力強化禮樂教化，永初2年親自主持孝廉、秀才兩科的策試；永初3年，劉裕下詔「備選儒官，弘振國學」；⁸⁹

⁸⁶ 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76，頁1729。

⁸⁷ 梁·劉勰：《文心雕龍》（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年），卷9，頁675。

⁸⁸ 梁·沈約：《宋書》，卷64，頁1696。

⁸⁹ 梁·沈約：《宋書》，卷3，頁56、58。

並曾多次組織文學雅集，⁹⁰甚至開始學習談論，⁹¹可惜早逝而多所未行。宋文帝博涉經史，善隸書，少覽篇籍，頗愛文義；⁹²在位期間曾於元嘉 15 年（438），詔雷次宗立儒學於雞籠山，推重禮學，隔年又召開玄、文、史三學；19 年則詔開國學，其曰：

夫所因者本，聖哲之遠教；本立化成，數學之為貴。故詔以三德，崇以四術，用能納諸義方，致之軌度。盛王聖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憲章弘遠，將陶鈞庶品，混一殊風，有詔典司，大啟庠序，而頻邁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鴻烈。今方隅乂寧，戎夏慕嚮，廣訓胄子，實維時務。便可式遵成規，闡揚景業。⁹³

強調學校教育的重用，兼顧四術，並宣稱「盛王聖世，咸必由之」，而其所面對的當前挑戰，誠來自北魏邊境，也促使其亟欲透過學術傳承，使得「戎夏慕嚮」。但後來還是因元嘉 27 年與北魏征戰而頽廢，直至宋孝武帝大明 5 年（461）八月才又修復國學，並詔曰：

自靈命初基，聖圖重遠，參正樂職，感神明之應；崇殖禮園，奮至德之光。聲實同和，文以均節，化調其俗，物性其情。故臨經式奠，煥乎炳發。道喪世屯，學落年永，獄訟微衰息之術，百姓忘退素之方。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棧山航海，向風慕義，化民成俗，茲時篤矣。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胄。⁹⁴

此詔言孝武帝自受命以來，即力圖正樂崇禮，感嘆世衰道微，學風不振，官民失格。同時也延續了文帝詔對於邊境威脅的警覺，並肯定國家教育的重要性。然而兩封詔

⁹⁰ 參見羅建倫：〈宋武帝劉裕文學雅集略考〉，《中國文學研究》第 4 期（2012 年 10 月），頁 26-29、35；孫淑娟：〈劉裕北伐後秦與士族文人的轉變〉，《東岳論叢》第 37 卷第 12 期（2016 年 12 月），頁 188-190。

⁹¹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卷 14，頁 269。「梁武帝」條引梁·沈約《武帝集·序》曰：「漢高、宋武，雖闕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暮年。」相關研究可參見田慶餘：〈劉裕與孫恩——門閥政治的「掘墓人」〉，《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26。王永平：〈論宋武帝劉裕之文化素養及其文化傾向〉，《史學月刊》第 2 期（2009 年 2 月），頁 52-62。

⁹² 梁·沈約：《宋書》，卷 5，頁 71、卷 95，頁 2341。

⁹³ 梁·沈約：《宋書》，卷 5，頁 89-90。

⁹⁴ 梁·沈約：《宋書》，卷 6，頁 128。

書就呈現了相當不同的書寫風格。前者屢屢追溯遠教先行，典重淵雅；後者則多用景、物喻寫的遠遊，極言外邦受德義的感召，築棧道以攀登高山，趨船隻以航渡大海，象示歷經艱險，長途跋涉而紛紛投奔，既描繪國泰民安的景象，也蘊含對和平與道德教化的嚮往。其中「棧山航海」還挪用了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的句子，⁹⁵與詔令動輒引用經典，顯得更加靈動活潑。儘管詔令多假手中書省，⁹⁶然這裡正可證實了史稱：「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⁹⁷也即是宋孝武帝以帝王之尊，好尚文采，改變了文帝一朝崇尚經史文風的說法。稍晚裴子野〈雕蟲論〉也有同樣的觀察，其曰：「宋初迄於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流波相當，茲有篤焉」⁹⁸其中雖有微詞，在文學品好上有不同的評斷，卻可見其撰文賞閱風氣的流行。

在史料中，文筆與詩筆未必截然二分，但在六朝人的觀念中實有文筆之分，《文心雕龍·總術篇》即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⁹⁹因此在談論大明文壇的盛況，往往以詩人的活動為中心。根據研究，從《宋書》、《南史》、《詩品》，乃至逯欽立《先秦漢魏南北朝詩》的著錄，大明詩人計有 24 人，且多為與孝武帝關係密切，曾受其拔擢者，既有受孝武帝賞識的寒士如鮑照、蘇寶生、戴法興、徐爰、顏師伯……，也有高門如謝莊、王僧達、袁粲、何偃，皇室如劉義恭、劉宏，女詩人鮑令暉、韓蘭英，以及因文才而還俗的湯慧休。《詩品》作為品評從東漢至南北朝 564 年間五言詩人的詩評作品，囊括大明詩人計有 12 人，包括劉駿、王僧達、顏測、湯慧休、謝莊、鮑照、鮑令暉、吳邁遠、蘇寶生、劉宏、戴法

⁹⁵ 顏延年（字延之，384-456）〈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曰：「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2051。

⁹⁶ 根據李浩：《天子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魏晉南北朝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77：「東晉末年的文書平省職能恢復亦只是曇花一現；到宋齊時代，散騎省更是退化為專以侍從、撰述為職的一般性事務機構，並改稱集書省，隸屬於門下。《初學記》卷 12《職官部下》曰：散騎（常侍）自宋以來，其任閑散，用人益輕，別置集書省領之。」。

⁹⁷ 梁·沈約：《宋書》，卷 22，頁 595。

⁹⁸ 梁·裴子野：〈雕蟲論并序〉，收入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年），卷 742，頁 3873。

⁹⁹ 梁·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頁 655。

興、韓蘭英等，約莫佔所有人數的一成。可見在劉駿在位不到十二年間，賦詩的文學活動更為活躍，參與者的身分亦頗為廣泛，並且多半在南朝的文壇上獲得一席之地。即便是詔、策、移、檄、章、奏、書、啟等實用文體，亦習染了駢對的句式和鋪陳刻畫的手法。四庫館臣在梅鼎祚《宋文紀》提要中即云：「宋之文，上承魏晉，清竣之體猶存。下啟齊梁，纂組之風漸盛。于八代之內，居文質升降之關，雖涉雕華，未全綺靡。」¹⁰⁰推究當時文學形成的機構與場域，基本上可為四點：一為大力擢拔文章之士；二為沿用「集錄比詔比璽，為諸優文策文，平處諸文章詩頌」的集書省；¹⁰¹三為設置清台令，平衡大明以來好詞賦、輕經史的學術狀況；四為孝武帝親自組織文學唱和的文學集會。¹⁰²

有關當時的文學雅集，學者研究者已多，本文則主要從南北詔書的書寫立論，然此終究為一時盛事，該集團作品豐富，創作題材多元，¹⁰³聊以《藝文類聚》卷 56 所載有〈華林都亭曲水聯句效柏梁體詩〉為例，其曰：

九宮盛事予旒纊。三輔務根誠難亮。策拙粉鄉慚恩望。折衡莫效興民謗。侍

¹⁰⁰ 清·永瑢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卷 189，頁 4207，「宋文紀十八卷」條。

¹⁰¹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 26，頁 722。〈百官志·上〉曰：「集書省置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四人。員外散騎常侍無員，散騎侍郎、通直郎各四人。又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奉朝請、常侍侍郎，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省諸奏聞文書。意異者，隨事為駁。集錄比詔比璽，為諸優文策文，平處諸文章詩頌。常侍高功者一人為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逋違。」根據李慧波〈魏晉南北朝之集書省述略〉指出，劉宋朝為集書省的設立成為「六散騎」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孝武帝欲重其選，成為與門下省互為平行的機構。見李慧波：〈魏晉南北朝之集書省述略——以「六散騎」的變遷為中心〉，《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29 卷第 3 期（2010 年 6 月），頁 91。

¹⁰² 刁麗麗：《宋孝武帝與大明詩壇》（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9 年）為最完整的研究成果，參酌大陸地區的前行研究，分別從材料、制度、組織、創作和品評論，乃至該時期文學特色和影響進行論述；刁麗麗另有〈劉宋時期文壇轉向探析〉一文，則探討大明時期的詩風由用典繁密轉向緣情的關鍵成因。見刁麗麗：〈劉宋時期文壇轉向探析〉，《石家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35 卷第 5 期（2023 年 10 月），頁 30-35。王坤也在《劉駿年譜》研究中，注意到宋孝武帝雅好文學、促使士風轉以文采相尚的特徵。見王坤：《劉駿年譜》，頁 15-17。羅建倫則注意到宋孝武帝以文章取士，並舉辦文學雅集與群臣唱和的時代現象。見羅建倫：〈宋孝武帝劉駿文學雅集述略〉，《中國韻文學刊》第 26 卷第 4 期（2012 年 10 月），頁 75-78。

¹⁰³ 詳參祁立峰：《南朝文學集團詩賦書寫策略之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 年），頁 109。

禁衛儲恩踰量。臣謬叨寵九流曠。喉唇廢職方思讓。明筆直繩天威諒。¹⁰⁴

從詩題來說，即可知此乃宋孝武帝劉駿主持曲水宴會的共同賦詩，地點在華林都亭。

《宋書·禮志》記載：「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群臣，晉海西鍾山後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¹⁰⁵裴子野《宋略》亦載：「文帝元嘉 11 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游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¹⁰⁶是以在孝武帝劉駿世亦延續了藩王外鎮送行，以及流觴賦詩的慣例。而柏梁體的特色則是每句押韻、一韻到底的七言詩。本詩共八句，每人一句，皆押陽韻。根據註文記載了每句作者，第一句為孝武帝劉駿所作，第二句為江夏王劉義恭，第三句為竟陵王劉誕，第四句為領軍將軍柳元景，第五句為太子右率張暢，第六句為吏部尚書謝莊，第七句為侍中何偃，第八句為御史中丞顏師伯。凡此聚集了當時政壇與文壇的頂尖人物，各自根據其身分和職務向朝廷輸誠，呈顯皇朝氣象。

綜上所述，可見孝武帝劉駿誠乃傾國家之力，一方面承繼父祖心願，另一方面則從制度與實踐雙向帶動「文」的全面進展。

相對於此，北魏前期文學則是延續了十六國及兩漢文學的創作特色，整體來說，仍以典正質樸為主，較多表、奏議、政論之「筆」。太武帝拓跋燾在神麿 4 年（431）大量徵召漢族士人，高允（390-487）〈徵士頌并序〉追憶當年，徵召的標準乃是「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此即北方的高門望族，如盧玄、杜詮、崔綽、李靈、李熙、邢穎、劉遐、高允、游雅、張偉、張誕等，應徵進入平城的中書省，「皆拜中書博士」、「中書侍郎」，亦曾「或從容廊廟，或遊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促成短暫的文學榮景，後來皆因崔浩案而告終結。由於面對殘酷的殺戮，深怕受到崔浩案的牽連，是以當時士人階層普遍皆有「懼罪」心態，以致自文成帝至獻文帝時期，「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高允亦然，乃自歎「不為文

¹⁰⁴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 56，頁 1004。

¹⁰⁵ 梁·沈約：《宋書》，卷 15，頁 386。

¹⁰⁶ 宋·顏延之：〈顏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收入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 46，頁 2049。

二十餘年矣」！¹⁰⁷殷孟倫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評價其文為「洪量似文饒（劉寬，120-185），風節似汲長儒（汲黯，?-108 B.C.）」，回溯至兩漢風格，可見其古樸，少有新意。此一文化教育的落後，一直要到在獻文帝拓跋宏（454-476）即位之初，天安元年（465）高允奉召作〈承詔議興學校表〉，表達關切文教之興，曰：

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為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敘。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¹⁰⁸

開篇即強調自古以來教育的重要性，認為治國必先以教育、文化為基礎；次則念及自永嘉以來，文化教育衰敗，雅頌之聲消失，釋奠之禮斷絕，展現對文化衰敗的危機意識。進而追溯描述過去各朝對於復興文教的嘗試及其困難，強調當前皇帝對文教復興的重視和決心。該文以散體為主，難以若干駢句，全篇句式結構嚴謹，引經據典，多次引用詩、禮等古典文獻和歷史事件，運用古今比較對比，增強本文的感染力和說服力。相較於劉宋四學並重，北魏則更受儒家思想影響，通篇體現了儒家重文治國、教化為本的思想，既表現北魏初期學術與文章上的特色，也彰顯了重建教育與文化的急切性，同時暴露了北魏王朝作為正統的最大弱點，展現出當時南北文學不同的進程。

¹⁰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 48，頁 1078-1085。

¹⁰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 48，頁 1078。

四、結論

劉宋自高祖劉裕建國，以「力」來克定禍亂，威強敵德，由此建立起個人的權威感，以及王朝合法性與神聖性，「武德」乃成為劉宋子孫共同推尊的國家性格和家族記憶，不僅由文帝劉義隆繼承，也遺傳至孝武帝劉駿，其中既有南北對峙的歷史現實，也受到「劉氏之讖」的影響，刊定四海被視為「天命」之所繫，乃成為不可逃避的歷史責任。儘管三人性情遭遇各有不同，都曾與驍勇善戰的北魏展開深淺不同的軍事交鋒，劉駿在爭取帝王崛起的過程中，即屢屢試圖與父、祖身影疊映，建立個人繼承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同時也形塑出劉宋初期尚武的帝國形象。

另一方面，受到南方士族社會的浸潤，劉氏皇族歷經了文學化的過程，由最初武帝的頗慕風流，到文帝的愛好文義，進而至孝武帝以文采相尚，厚實了南朝的文化資源。又適逢宋文帝傾全國之力，三次北伐終告失敗，這樣歷史現實促使孝武帝劉駿勢必調整戰略方式，諸如前行研究所論及，包括設王畿、立明堂、造五輅、改朝樂等，透過「禮樂」的空間、視覺、聽覺改變，重塑劉宋的正統性。本文則從文帝改謚的現象，發現劉駿藉由謚典「經緯天地」之意的闡發，以「文」重塑劉宋王朝的性格，以配具有創始之意的太祖廟號，從而掩飾其父武功征伐的失敗。後續更以帝王之尊，傾國之力，在帝國之都盛倡禮儀之學、推廣藝文雅集，凡此種種看似無關戰爭，實則以不戰己方的文治，對比於好戰北魏的無文。故孝武帝劉駿以此博取「孝」義，不僅型塑自己的「文」德，從而塑造劉宋王朝的新形象，由此可證其文戰之功，可謂開啟南方政權的統治術的先猶。

徵引文獻

一、古籍文獻

漢・宋衷注，清・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

漢・蔡邕撰：《獨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晉・王纂授：《太上洞淵神咒經》，收入明・張宇初、邵以正、張國祥編纂：《正統道藏・洞玄部》第1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晉・王纂授：《三天內解經》，收入明・張宇初、邵以正、張國祥編纂：《正統道藏・洞玄部》第87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梁・慧皎：《高僧傳》，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

梁・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梁・劉勰：《文心雕龍》，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年。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唐・許敬宗編，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平：古籍出版社，1956年。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

宋・李昉等編撰：《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長沙：嶽麓書局，2011年。

清・永瑢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二、今人論著

刁麗麗：《宋孝武帝與大明詩壇》，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9年。

刁麗麗：〈劉宋時期文壇轉向探析〉，《石家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35卷第5期（2023年10月），頁30-35。

王坤：《劉駿年譜》，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3年。

王永平：〈論宋武帝劉裕之文化素養及其文化傾向〉，《史學月刊》第2期（2009年2月），頁52-62。

*田曉菲著，何維剛、雷之波譯：〈南朝宮廷詩歌裏的王權再現與帝國想像〉，《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30卷第1期（2020年3月），頁141-182。

田慶餘：《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朱子彥：《多維視角下的皇權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李磊：〈「肇構神京」與「締我宋宇」：劉宋的王畿設置與疆域界定〉，《社會科學》第9期（2018年9月），頁165-173。

李浩：《天子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魏晉南北朝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

李慧波：〈魏晉南北朝之集書省述略——以「六散騎」的變遷為中心〉，《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29卷第3期（2010年6月），頁90-94。

何德章：《魏晉南北朝史叢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呂宗力：《漢代的謠言（修訂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

祁立峰：《南朝文學集團詩賦書寫策略之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年。

*林飛飛：《劉宋帝王與宗教關係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專門史博士論文，2013年。

周松：〈柔然與南朝關係探略〉，《青海民族學院（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2期（2000年4月），頁44-50。

- 姜望來：〈皇權象徵與信仰競爭：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31 輯（2015 年 7 月），頁 110-125。
- 徐沖：《漢魏革命再研究：君臣關係與歷史書寫》，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
- 孫淑娟：〈劉裕北伐後秦與士族文人的轉變〉，《東岳論叢》第 37 卷第 12 期（2016 年 12 月），頁 184-190。
- 陳寅恪：《陳寅恪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
- *梁滿倉：《魏晉南北朝五禮制度考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
- 張金龍：〈北魏中後期的北邊防務及其與柔然的和戰關係〉，《西北民族研究》第 2 期（1992 年 2 月），頁 49-63。
- *逯欽立：《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 赫兆豐：〈正統的訴求與建構——對劉宋文帝「太祖」廟號的考察〉，《北京社會科學》第 8 期（2017 年 8 月），頁 28-38。
- 魯力：〈孝武帝誅竟陵王事與劉宋宗王鎮邊問題〉，《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3 卷第 5 期（2000 年 9 月），頁 622-625。
- 劉永中：《魏晉南朝禪代研究：以「力」、「命」、「禮」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 *劉苑如：〈嵩山受璧／長安開霸——劉裕英雄試煉與創業神話敘述〉，《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第 10 期（2018 年 1 月），頁 87-123。
- 劉苑如：〈酒洩之贈：宋魏征戰的犒勞遊戲〉，《桃の会論集九集——小南一郎先生傘壽記念論集》，京都：桃の会，2024 年，頁 73-88。
- 羅文星：〈北魏太宗、世祖朝的繼承問題與政局〉，《成大歷史學報》第 53 號（2017 年 12 月），頁 1-51。
- 羅建倫：〈宋武帝劉裕文學雅集略考〉，《中國文學研究》第 4 期（2012 年 10 月），頁 26-29、35。

羅建倫：〈宋孝武帝劉駿文學雅集述略〉，《中國韻文學刊》第 26 卷第 4 期（2012 年 10 月），頁 75-78。

嚴耀中：〈佛教型態的演變與中國社會〉，《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2 期（2001 年 3 月），頁 32-39。

〔日〕大淵忍爾：《道教史の研究》，岡山：岡山大學共濟會，1964 年。

〔日〕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90 年。

〔日〕小林正美著，李慶譯：《六朝道教史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日〕戶川貴行：〈劉宋孝武帝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建康中心の天下觀との関連からみた〉，《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 36 卷（2008 年 3 月），頁 68-87。

* 〔日〕戶川貴行：〈東晉南朝における民間音楽の導入と尺度の関係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 73 卷第 4 期（2015 年 3 月），頁 39-70。

〔日〕吉岡義豐：《道教經典史論》，東京：五月書房，1988 年。

〔日〕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高雄：佛光出版社，1985 年。

Tian Xiao Fei, “Representing Kingship and Imagining Empire in Southern Dynasties Court Poetry” *T'oung Pao* 102.1.3 (2016), pp. 18-73.

（說明：書目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Li Lei, “Define Territory and Construct Capital: The Legitimate Appeal and Its Operation of Emperor XiaoWu’s Succession of the Throne in Liu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9 (Sep. 2018), pp. 165-173.
- Liang Man Chang, *Wei Jin Nan Bei Chao Wu Li Zhi Du Kao Lun* [Research on Wu Li system in the Wei Jin Nan-Bei Dynastie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
- Lin Fei Fei, *Liu Song Di Wang Yu Zong Jiao Guan Xi Yan Jiu* [A Study on Relation between the Emperors and Religions in Liu Song Dynasty] (Tianjin: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Special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2013).
- Liu Yuan Ju, “Receiving Jade at Song Mountain and Paving the Way to Hegemony at Chang'an: Liu Yu's Hero Trial and the Myth”,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10 (Jan. 2018), pp. 87-123.
- Lu Qin Li, *Xian Qin Han Wei Nan Bei Chao Shi* [Poetry of Pre-Qin, Han, Wei,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1).
- [Liang] Shen Yue, *Song Shu* [Book of S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Togawa, Takayuki, “The reform of the courtesy system in Liu-song 劉宋 Xiao-wu-di 孝武帝: in relation to the world view”, *The Oriental Studies* 36 (Mar. 2008), pp. 68-87.
- Togawa, Takayuki,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roduction of Folk Music into Ceremonial Music and Musical Scales in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Journal of Oriental Researches* 73.4 (Mar. 2015), pp. 39-70.
- Tian Xiao Fei ed., Ho Wei Kang, Zeb Raft trans., “Representing Kingship and Imagining Empire in Southern Dynasties Court Poetry”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30.1 (Mar. 2020), pp.141-182.
- [Bei Qi] Wei Shou, *Wei Shu* [Book of We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